

1892—1978

郭沫若的文学道路

袁牧之

天津人民出版社

I206.7/32-2

郭沫若的文学道路

(修订本)

黄侯兴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1749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年1月

郭沫若的文学道路

(修订本)

黄侯兴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4插页 269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印数: (平)8,601—18,600
(精)1—500

统一书号: 11072·67

定 价: (平)2.15元
(精)3.15元



五十年代摄于北京寓中（大院胡同五号）



一九四九年七月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期间与茅盾、周扬
合影



一九二六年与创造社
同人成仿吾、郁达夫
王独清摄于广州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庆祝五十寿辰及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时摄，手中大笔是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人赠送的礼物

序

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和鲁迅一样，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从“五四”开始就站在时代的前列，给予了现代文学发展以重大影响的，如同恩格斯所说的文学方面的“巨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活动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这就是说，他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的作品是真正的时代的艺术、人民的艺术。“他的创作生活，是同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周恩来《我要说的话》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而且终其一生，虽然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但始终是和中国人民共呼吸的。他的作品，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女神》，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屈原》，总是以艺术的方式，充满激情而又深刻地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并且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产生了很大的鼓舞力量，从而获得了真正的艺术生命。就这一点说，郭沫若与鲁迅是完全一致的。正是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构成了从

“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学的革命传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们必须多方面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貌和它的丰富复杂的内容，特别是对于象鲁迅、郭沫若这样有重大贡献并且可以代表发展方向的作家，更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展开系统的专题的研究。因为科学地总结他们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道路，深入地研究他们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对于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规律，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郭沫若研究这一课题来说，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对一些著名篇章作出细致的分析或评介，而应该要求有这样的著作出现，它能够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的背景下，对作家的发展道路、创作倾向和艺术成就，作出全面的科学的综述和研究，但这在目前显然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现在，黄侯兴同志经过长期的研究，写出了这本系统地研究郭沫若文学发展道路的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不足，满足了读者的需要，这是十分可喜的。

黄侯兴同志这本书，并无特别的惊人之论，文字也很朴实，这对郭沫若这样一位才华洋溢的诗人、剧作家来说，也许是另一种的不同的风格。但它也显示了作者自己的特色：扎实而严谨，而这正是科学研究著作和文学创作不同的地方。黄侯兴同志注重材料的翔实，严肃认真，立论务求从作品实际出发。他用了很大工夫发掘未收入文集的佚文，对于已收集的作品也尽可能地根据最初发表的报刊进行校核，而且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发现。这就使他的论点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增强了论述的科学性。对于郭沫若本人在不同时期发表过的关于自己思想和创作的许多意见，黄侯兴同志也参考有关材料，按照作者

当时思想和作品的实际，采取了认真的有分析的态度。例如郭沫若曾经说过他在一九二四年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以后，“便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黄侯兴同志在本书中根据郭沫若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同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中发表的一些文章（其中有未收入集中的《马克思进文庙》等文），有说服力地指出：“郭沫若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认识是相当驳杂混乱的”，从而说明郭沫若从转向马克思主义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要经过一个更长的历程。根据黄侯兴同志的研究，郭沫若经过一九二四年底参加宜兴调查的实践、一九二五年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锻炼，特别是经过北伐战争的实际考验，以一九二七年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文章为标志，才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论点当然还可以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他的论证是谨严的，显然比那种只根据郭沫若的自述来立论要有更多的科学根据。

黄侯兴同志在本书中还力求对郭沫若创作的得失作出科学的评价，并从中总结经验和规律，他所坚持的仍然是从作品实际出发的态度。在郭沫若研究中长期以来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郭沫若的《恢复》等诗集由于作者世界观的转变，采取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因而比《女神》有更高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并由此推论，认为从《女神》到解放后的诗歌，郭沫若的诗一贯保持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尽管这一论点与读者对作品的实际感受是有距离的，但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很少人对此提出异议。黄侯兴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作品的客观效果来考察，对郭沫若的创作道路提出了新的看法，并且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细致地分

析了郭沫若的艺术个性，指出“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的抒情诗人，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但不善于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の体察与分析”，因此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比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更加适合于郭沫若的艺术个性。他的《女神》正是一曲浪漫主义的高歌，表现了“五四”时期昂扬的时代精神，开创了一代诗风。但后来郭沫若“在实现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曾经尖锐地批判和彻底地否定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恢复》便是郭沫若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初步运用。他想要在实现思想转变的同时，也能实现他的艺术风格的转变。然而，《恢复》等诗集已经说明，勉强转变自己的艺术风格，对他是有害的，其客观效果便是诗人降低了对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作品存在着概念化的毛病”。以后从流亡国外所写的历史小说集《豕蹄》开始，郭沫若又回到浪漫主义的道路上来。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他的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的创作中，再次擎起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达到了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由上述例证可以看出，黄侯兴同志通过对郭沫若创作道路的全面考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诸如作家如何正确地认识与把握自己的艺术个性，就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果能够提到理论的高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的探讨，对于今天的创作当会有更大的启示作用。

在关于郭沫若历史剧的论述中，黄侯兴同志对作品的一些主要特征和经验还作了理论上的探索和概括。如关于塑造正面形象以及古为今用等问题，他都根据充分的材料，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和评价。此外还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剧与历史的区别，以及浪漫主义剧作的特点，因而比较准确地说明了郭沫若历史剧的特色和成就。

关于郭沫若的研究是一项正在开展的重要的研究课题，黄侯兴同志这本严谨朴实的书就是这一课题的一项可喜的收获。这不仅表现在它的许多具体的论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郭沫若文学成就的认识，而且它所显示的“从作品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也是有重要启发的。因此，我很愿意把它推荐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者和郭沫若著作的爱好者。

王 瑶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王 瑛(1)
第一章 “家在峨眉画里”	(1)
童年时代——受诗教的第一课	(1)
少年时代——诗的习作	(9)
第二章 走出夔门，探索人生道路	(22)
东渡日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22)
第三章 《女神》——中国第一部新诗集	(33)
五四狂飙——诗的爆发期	(33)
爱国主义——《女神》的诗魂	(47)
浪漫主义——《女神》的主旋律	(68)
泛神论——诗人前期世界观的哲学基础	(80)
第四章 在苦闷中继续探求出路	(101)
《星空》和《前茅》——祷告青春时代再来	(101)
前期历史剧——新时代女性的赞歌	(119)
前期小说和散文——青春时期的残骸	(136)
第五章 从“昂首天外”到“水平线下”	(158)
百川归海——实现思想转变的过程	(158)
《恢复》——狂暴的音乐，鞑靼的鼙鼓	(180)
第六章 海外十年的战斗生活	(193)
旅居日本——为中国革命准备新的力量	(193)

《冢蹄》——述往事而思来者·····	(207)
第七章 在八年抗战的洪波中·····	(232)
潜奔祖国——沿着鲁迅的方向前进·····	(232)
《战声集》、《蛸蛸集》——战取光明的号角·····	(246)
第八章 光彩夺目的新型历史剧·····	(259)
包孕古今——灌溉现实的蟠桃·····	(259)
取材史实——发展历史的精神·····	(273)
针线缜密——戏剧结构、情节和语言·····	(294)
博大浑融——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307)
第九章 特异的审美意识与艺术个性·····	(323)
有我之境——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艺术个性·····	(323)
曲折回环——在创作道路上的经验教训·····	(337)
激情未减，风骨犹存·····	(354)
后记·····	(370)
修订后记·····	(372)

第一章 “家在峨眉画里”

童年时代——受诗教的第一课

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
向资本主义转换的时代。……^①

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背靠秀冠神州的峨眉山的第二峰——绥山，面临波涛滚滚的大渡河，下傍水碧如靛的青衣江，淙淙茶溪从峨眉山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穿过市镇；广阔的田野左右展开；这个气势雄伟、风景秀丽的好地方，便是郭沫若同志的故乡。

郭沫若，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他行八，出生时已死去两姐一兄，还有两兄两姐，母亲亲昵地呼之“八儿”。乳名文豹，取“豹子投胎”之意，号尚武，学名开贞，笔名之一“沫若”，是取他故乡的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两河合拢之意。

“峨眉山在笑，大渡河在轻歌曼舞”。

峨眉山，“天边树若荠”，威严可畏。清晨，白云笼罩着半山，旭阳升起，山头渐渐显露，白雾凝结成一条博带，围系山

^① 《我的童年·前言》，《沫若文集》第六卷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腰，景色优美如画。大渡河，夏天水流湍急，深红色的河水狂吼着，在群山中间迂回前进，冬天水落，河碛中处处呈露出绿洲，带着整齐的寒树，加上农人的小春，犹如江南风光，旖旎别致。郭沫若便是在这峨眉山下、大渡河畔长大的。他望着巍然的峨眉山轻轻地歌唱：“峨眉山，峨眉山，你的山在那一边，”^①他和兄姐们在山下望月，唱着“月儿光光，下河洗衣裳”，“天又高，一把刀。刀又快，好截菜”一类的儿歌^②；他沐浴着浩荡的河水，感受到了“那山下的大渡河的流水，是滔滔不尽的诗篇”^③。他在这里享受了天国的快乐，度过了他最美好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他对这个秀丽多姿的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

郭沫若后来走上文学的道路，成为中国近代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当然不尽是地理环境的原因。但是，正如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九日给四川草堂文学研究会诸乡友的信中所说：“吾蜀山水秀冠中夏，所产文人在文学史上亦恒占优越的位置。工部名诗多成于入蜀以后，系感受蜀山蜀水底影响……。”^④四川“绝好的山河”曾经给历史上许多文学家、诗人以丰富的滋养；同样，峨眉、凌云、岷江、大渡等名山大川的宏伟气魄和博大精神，对于郭沫若的性格的陶冶，对于他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形成，也是有着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可以说，大自然养育了这样一位未来的东方诗人。

郭沫若出生的时候，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下面临着空

① 《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19页。

② 《儿童文学之管见》，《沫若文集》第十卷第153、154页。

③ 《恢复·峨眉山上的白雪》，《沫若文集》第一卷第368页。

④ 四川《草堂》1923年5月5日第3期。

前的民族危机，社会经济正在加速殖民地化。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大量倾销商品，加速了中国城乡手工业的破产；对中国原料的疯狂掠夺，又刺激了中国农村某些经济作物的发展。郭沫若家从凋零、衰败到振兴、发达的过程，便是十九世纪末近代中国商业经济更加殖民地化的反映。

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是一个很有实业家手腕的精明的商人。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他酿酒、榨油、卖鸦片烟、兑换银钱、果纳五谷，几年间就使家业恢复起来。在郭沫若记事时，家里的生活已经相当优裕。所以郭沫若说：“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虽然土地好象并不那么多，但在那偏僻的乡窝里，也好象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①“作为地主阶级的儿子，在这儿我没有吃过苦。农夫耕耘时常唱秧歌，我觉得好听。撑船的人和拉纤的人发出欸乃的声音，我佩服他们有力气，冬天不怕冷。牧牛童子横骑在水牛背上吹芦笛，我觉得他们好玩而水牛可怕。乡镇上逢集的时候热闹一番，闲天又冷下去。人们除坐茶馆、聊闲天外，没有人生”^②。这种无忧无虑、悠然自得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使幼年的郭沫若不懂得人民的疾苦和世态的炎凉。他不象鲁迅那样，“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因而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③；他沉浸在充满幻想的幸福生活之中，他的幼年主要是从家庭教育和书本知识中去汲取思想营养的。

引导郭沫若走上文学的道路，使郭沫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当然不是由于所谓母体的“遗传因数”，但是这和他的母亲嗜好

① 《我的童年》，《沫若文集》第六卷第14页。

② 《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19、120页。

③ 鲁迅《呐喊·自序》。